

1940年代日本??北?村??的交?学意? - 以《中国?村? 行??》?中心

著者	? 蕾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10
page range	727-737
year	2017-03-3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Japan's Inter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Rural Investigat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1940s : Centering on the Survey of Rural China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10954

1940年代日本对华北农村调查的交涉学意义

——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中心

杨 蕾*

Japan's Inter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Rural Investigat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1940s- Centering on the Survey of Rural China

YANG Lei

Since the 20th century in Japan for a number of solid-state survey in rural China, a considerable part of Old Chinese rural tradition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order of investigation, it is also known as “used to line the investigation” or “old inertia investigation.” A long time these surveys carried out large-scale, wide geographical scope,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military, Japan offers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materials to help Japan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in China. These survey data at the time and after the war,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as the two scholars of China's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survey of China's rural customary practice, and analyze and probe into Japan's survey of rural customary practice in North China in the 1940s.

Keywords: 1940s North China Japan China's rural customary survey Intercultural Significance

前言

20世纪以来日本针对中国农村的若干实态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旧中国农村传统习惯、生产方式与社会秩序的调查，因此又被称为“惯行调查”或“旧惯调查”。这些调查进行的时间长、规模大、地理范围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为日本提供了各种情报材料，客观上帮助日本了解了中国的情况。这些调查资料在当时和战后，陆续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出版，成为两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资

* 杨蕾：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本文受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4CLSJ16）和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13SQR023）资助。

料。其中，由东亚研究所和满铁“惯行班”实施调查，并由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于1952-1958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六卷（岩波书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华北农村调查资料，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交涉的形式之一。

一些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利用日本惯行调查报告对中国近代农村变迁进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如：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旗田巍《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福武直《中国农村的社会构造》、内山雅生《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等。这些研究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侧面为我们展现了近代华北乃至近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图景，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利用日本惯行调查资料还不是太多。

本文将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中心，对20世纪40年代日本针对中国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概况和成果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日本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与满铁“惯行班”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随着战局的变化，日本侵华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华北，开始对华北进行更广泛地详细调查。具体到华北农村的惯行调查来看，则开始于1939年下半年。

日本的中国华北农村惯行调查计划开始于1939年10月，由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山田三良）主导，与华中商事惯行调查计划及其他计划并列进行。与农村惯行相关的调查员由东京大学的研究者构成。与此计划相呼应，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又在北支经济调查所中成立惯行调查班，以杉之原舜一为首组成农村调查的阵容。¹⁾

由此可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与华中商业调查同时进行，其调查机构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以东京大学的学者为主体的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另一部分是满铁的北支经济调查所，以杉之原舜一为首。两方面机构相互协助。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成立于1906年6月，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会社”，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在铁道公司的职能之外，还充当了调查我国物产和自然资源以及为日本提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情报的特殊使命。满铁对华北农村惯行的实质性调查开始于1940年，但其前期准备性调查则于1939年就已经开始。当时，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第三班（1941年改称为“惯行班”）的村田久一、山本斌、佐野利一、安藤镇正、小沼正、盐见金五郎、刘钧仁等，以地方志为基础，对其中的惯行资料进行了检索，对京汉、京沽、正太铁路沿线农村的概况、绥远土地关系等资料进行了整理。1940年，杉之原舜一、杉浦贯一、早川保、本田悦郎、内田智雄、旗田巍加入该调查所第三班，杉之原舜一成为调查指导。²⁾

1)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1952年12月15日首版），第5页。

2) 《末弘博士的调查方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7页。

以下是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委员³⁾ 名单：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委员

(顾问)	山田三良	(前会长)	末弘严太郎	矶田 进
	内田力藏		戒能通孝	德田良治
(代表者)	仁井田陞		平野义太郎	(干事) 福岛正夫
	我妻 荣		田中清次郎	天海谦三郎
	伊藤武雄		押川一郎	(干事) 幼方直吉

(以下旧满铁调查部惯行班)

杉之原舜一	安藤镇正	内田智雄
小沼正	佐野利一	盐见金五郎
杉浦贯一	(干事) 旗田 巍	早川 保
本田悦郎	前田胜太郎	村田久一
山本义三	山本 斌	

由这个名单能清楚看出该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两套系统。上半部分主要是东京大学的学者，以末弘严太郎为首，平野义太郎、仁井田陞、福岛正夫、戒能通孝、矶田进、德田良治等法学者是调查员的主体；后半部分是以杉之原舜一为首的满铁调查部惯行班的成员。由此能看出20世纪40年代日本对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活动的性质——虽然有学者参与，具有学术调研的目的和特点，但是由于和殖民调查机构“满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调查团成初就不可避免地具备了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性质。

满铁惯行班调查员的工作步骤是，首先利用四个月时间进行调查项目的讨论和制定（1940年6-10月），并明确分工（见表1），然后各负责人对负责项目提出项目草案，再进行全体讨论，不断对草案进行修改和调整，最终形成相对完备的目录——《调查项目》。在制定调查项目的过程中，各调查组虽有不同的专长，也有不同的调查方向和方法，但也对共同研究进行了关注，即对旧中国农村农业和日常生活等关系的研究。

3)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7页。

表1：满铁惯行班“中国惯行调查”各项目组分工及其负责人

项目	负责人	项目	负责人
土地所有权	杉浦贯一	土地买卖	早川保
农作	山本义三	水	杉浦贯一
地籍及土地公证	盐见金五郎	课税	佐野利一、小沼正
金融	安藤镇正	家族、同族	内田智雄、早川保
村落	村田久一、旗田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惯行调查》第17页整理。）

由表2也能看出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项目，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买卖、农作、水利、税收、金融、家族、村落等各项与农村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在对这些项目进行分工后，以调查项目目录为基础，各组事先列出针对具体问题的各种提问。有时候调查项目中简短的一个项目，要提问数十项具体内容。

在调查区域的选择上，调查班预计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选取特定村落，就各个角度进行穷尽性的全面调查，一方面选取广阔区域，进行鸟瞰式的概括描述。但由于战局的影响，这种方针没有得到贯彻，最终只选取了河北的4个县和山东的2个县进行了调查。这些实态调查于1940年11月-12月正式开始。由全体人员参加的比较大的调查共进行了7次（如表2）。

表2：《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调查次数、时间及区域

次数	调查时间	调查区域
第一次	1940年11月-12月	河北顺义县沙井村、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庄
第二次	1941年02月-03月	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
第三次	1942年05月-06月	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庄
第四次	1942年10月-12月	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庄
第五次	1943年02月-03月	山东省历城县路家庄、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
第六次	1943年05月-06月	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山东省恩县后夏寨
第七次	1943年10月-11月	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河北省良乡县吴店村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8页整理）

调查班对以上河北和山东的6个县进行了概况调查、补充调查及各种特殊问题的实态调查，并做了原始记录。除此之外，调查班还对当地所收集的各种记录和文书进行了所谓的“文献调查”，尤其对河北省顺义、获鹿、临榆县的档案和古文书进行了整理。

二、日本对华北农村惯行实态调查的特点

1、细致而详尽的调查内容

调查班在特定的村落对各种问题进行了穷尽式的调查和访问，并进行了详细记录。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包括家族、村落、土地所有、耕作、水利、课税、金融等具体内容，

可以说包括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下是《调查目录》⁴⁾及示例，这些详细的资料可以成为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研究者的宝贵资料。

调查项目之一（东京方面）

甲 以土地关系为中心的惯行调查事项

- 第一 构成土地关系各主体的探讨及分析
- 第二 土地所有形态
- 第三 与地籍及土地相关的公证
- 第四 与土地利用相关的法律关系
- 第五 土地买卖及其他权利处分
- 第六 与水利灌溉相关的事项
- 第七 以农地关系为中心的公租公课
- 第八 农业以外的土地利用关系
- 第九 民国政府的诸土地政策
- 第十 农村的流通及金融诸问题

乙 商事及金融相关的惯行调查事项

丙 家族及村落相关的惯行调查事项

- 第一 家族 同族
- 第二 村落

调查项目之二（满铁方面）

- 第一 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调查项目
- 第二 以土地买卖为中心的所有权变动
- 第三 与耕作有关的调查项目
- 第四 与水相关的调查项目
- 第五 与地籍及土地公证相关的调查项目
- 第六 与农村公租公课相关的调查项目
- 第七 与农村金融及取引相关的调查项目
- 第八 与家族和同族相关的调查项目
- 第九 与村落相关的调查项目

这个调查目录依然可以体现惯行调查团的两个系统，一是“东京方面”，二是“满铁方面”。此外，体现出日本对旧中国华北农村调查内容的详尽性，以土地关系这一农村根本问题为中心，并涉及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土地问题自古就是中国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左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了解

4)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37-60页。

和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生产关系问题，是中国革命顺利推进的关键。从这些基本的农村经济、文化等关系的变化与变革出发，可以找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

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查方面，惯行调查虽然是对旧中国华北农村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但是它区别于社会学者的调查活动，这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点在《末弘博士的调查方针》一文中有所解释：

不满足于社会学者所进行的单纯对社会关系的构成形式和探究，对规范这种社会关系而形成的“法的惯行”也就是法的规范进行研究，以此为基础着力研究其实质性的组织和运转机制。比如，在调查家族构成实态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着眼于调查家族成员的数量、居住状况及其他外在的构成，而是主要关注家族内部的规律乃至权威关系、抚养关系等，留意人们的规范意识是如何作用的，我认为这才是通过对法的惯行的调查，探究中国社会特质的本调查的特征。⁵⁾

由此可以看出，惯行班对华北农村调查的内容和社会学学者的调查有不同之处，在家庭调查中，不仅调查人员构成和住房等外在情况，还对制约家庭关系的根本，即家庭内部关系进行了实态调查。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目录之一的“家族及村落相关的惯行调查事项”来一窥究竟（部分内容省略）：

第一 家族 同族

一、家族制度与土地制度、村落、乡党关系（略）

二、作为制度和思想的家族制度与现实家族制度的对比（略）

三、家族的构成（略）

四、家长的地位

（1）家长—什么样的人成为家长

（2）家长职责内容

①祭祀、家族统治、家产管理等

②与家族劳动的关系，指挥及领取家族劳动所得

③家的代表

（3）家长的义务及责任—抚养及祖宗祭祀、与家族成员行为相关的责任

五、家族生活

（1）家族成员对家长的态度、老人在家庭内部的地位、家族内部亲子、夫妻关系及子女地位

（2）家族成员的特有财产—在何种范围内被承认，特别是和家族成员的租赁收入的关系

（3）家族内部家庭成员的职责

（4）家族成员的衣食住行和娱乐

（5）家族房屋的构造、配置和用途—家族内部房屋的相互关系

六、家产及财产相续（略）

七、同族（略）

5) 《末弘博士的调查方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22页。

以上是调查目录之一的“家族及村落相关的惯行调查事项”的具体项目，其中重点摘录了第四五部分项目的内容。从这些与家族内部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来看，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中，对家庭生活内部的调查非常详细，涉及到农村家庭生活的很多方面。如，家长在家族中的职能、家长在家族劳动和家族收入中的作用、家庭内部主要的关系（夫妻关系、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等）、家族财产和家庭的关系（如房屋及财产等）。通过对家庭内部的构成关系的调查，可以了解维系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延续的农村家庭的内在运转情况，也可以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更进一步地说，从这些具体内容出发，可以揭示中国农业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正如解题中所提到的：“如果把握了中国农村逐渐变化的内在的组织和生活，可以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性。”⁶⁾

2、原生态的记录方式

在具体的实态调查过程中，调查员和农民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并进行详细记录。将该记录当成原始调查资料进行印刷，其中也包括和提问不相关的回答内容，尽量保持访问的“原形”。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根据调查员自身的判断进行整理，虽然有助于体裁的整齐划一，但今后评价发生变化之时，如果再想复原那些已经抛弃了的东西的话，则是不可能了。因此，虽然认为繁冗，但仍然尽可能详尽地保留了原形。在这一点上，调查员与农民（或其他人）的问答内容，可以称为“原生态”。因此希望惯行班所作成的资料是未经“整理之手”的调查资料”。⁷⁾在这一点上，这些学者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但同时，这些所谓的“原生态”记录，是否真正出于被调查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值得商榷的。在战争条件下，处于“被侵略者”的中国农民，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来自“侵略者”的调查，将直接影响到调查的真实性。地位上的先天的不对等，是这些调查难以回避的弊病。所谓的“实态”，很可能是带有战争印记的部分实态而已。

三、《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日本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性质

有关日本学者对中国农村进行惯行调查的目的，平野义太郎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解题里曾经这样写道：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和希腊罗马民族不同，不屈不挠地发展到今天，四亿七千万人口的世界性大民族（一大农业社会）仍然生生不息地发展着，因此非常有兴趣具体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尤其，这一大历史社会正在进行大变革，它是如何在旧制度的支配下开始窒息的？又是什么样的民族潜在力量使这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此外，在感受到旧制度的桎梏后，是怎样进行变革之路的，而且经过了怎样的变革走到了今天？了解这些问题是今天中国学的课题。⁸⁾

6) 平野义太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0页。

7) 《调查事业的沿革》，《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8页。

8) 平野义太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9页。

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拥有久远历史和文化的邻国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之所以将关注点落脚在旧中国的农村，主要原因是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了解中国的农村才能掌握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通过探究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惯行，来勾画其社会特质”⁹⁾。此外，平野义太郎还提到：

如果不能具体了解正在变革的旧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么就不能具体了解变革对象、目标，以及不能具体了解其变革所在的现实过程 and 方向。

在尊重民族形式情况下，如果不了解民众在旧有社会中所创造的、与民主相接近的庶民的惯行，那么就不能把握这个久远民族文化的特长将如何延续这一革命根本问题。

现在所进行的大革命正是社会革命，对其变革对象的旧社会的实态调查，为那些对所有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及历史、文化等各分野一也就是对中国抱有的人兴趣的人提供参考资料。¹⁰⁾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兴趣。这样的调查可以使他们把握最基层农民的现实的生活状态，更加了解旧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另一方面，也是其最关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这些研究，以中国农村内部所形成的接近民主的习惯法为切入点，来揭示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这一点对于当今中国学者的研究依然有所启示。在中国进行变革的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内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构成及变迁，来把握中国社会变革的未来。那么，日本学者的“学术性”调查目的，和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再版序中，旗田巍这样写道：

对于这个调查的目的，末弘博士曾提出，这个（调查）并非要成为立法和行政的参考资料，而是要把握规范中国农民社会生活的惯行——“活的法律”。这在战争当时，是大胆地提言，虽然肯定有不合调查计划者意图的方面，但我们的确是按照末弘博士的方针，在民法学者杉之原舜一氏的指导下，追求农村惯行的实态。没有想到其调查结果对占领政策的帮助。我们一直致力于纯学术的调查。¹¹⁾

虽然旗田巍一再强调这些学者们要进行的是所谓的“纯学术调查”，不以成为立法和行政参考为目的，但实际的调查活动全部在战争期间进行，难免被烙上战争的符号。满铁的侵略性质决定了调查活动的侵略性质。正如针对满铁的性质，曹幸穗所说：“1906年6月，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表面上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除了经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企业之外，还兼有调查我国的物产和自然资源以及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提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的特殊使命。”¹²⁾ 1940年之后的惯行调查出现了转向，随着战局的变化，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调查方针变成“需要马上有利于战局的调查”，为战争服务。随着战争结束，调查班也最终走向了解体，由国家化的调查活动逐步退化为研究者个人的研究活动。

9) 《末弘博士的调查方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22页。

10) 平野义太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9页。

11)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页。

12) 曹幸穗《满铁资料：清理历史的细节》，《社会科学报》，2005年5月。

2、《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解题中，平野义太郎分析了农村惯行调查对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意义。虽然上一节我们分析了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是打上了侵略战争符号的，但是仍然可以通过其中的叙述，进一步了解当时日本的学者从学术角度对惯行调查的认识。这些目的和认识将给中国学者产生有益的启示，客观上为中国学者的近代农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这些惯行调查和以往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日本之前被称为“支那学”，主要是以经书研究和训诂为主。这些对经书的研究活动不能解释中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平野义太郎这样写道：

这些经书何种程度上通过读书人、士绅渗透到人民生活中？或者说，是否成为乡绅统治农民的工具？道教的生活规范如何通过庙宇成为农民尊奉的道理等，并没有揭示儒、佛、道意识形态的实态。因此研究者有必要进行揭示实态的惯性调查。¹³⁾

可见，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学和训诂学并不能解释经书中的“道理”和道德是如何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通过实地调研才能解释这些内在的宗教及道德问题。这一点，从上文列举的《调查目录》中的“家族”部分的具体内容也可以体现——家庭内部的实际结构和相互关系等，很难通过经学研究揭示其面貌，必须通过实态调查找到答案。

第二，农村惯行调查研究和日本学者以往的“东洋史”研究也有所不同。在此之前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以关注王朝更替过程为主。但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农村社会，其生产关系是如何变动并推动社会变迁的，中国社会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将成为日本东洋史学者关注的内容。具体看来，正如平野义太郎提到的：“在农村繁衍生息的人们在封建地主、高利贷、商人三位一体制度的压迫下，是如何突破（这些枷锁）的？这些具体的实态尚未得到探究。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才更希望解决这些问题。”¹⁴⁾其实这也正是中国的这一点，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第三，农村惯行调查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内在原动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法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个以法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为主的调查团队，更关注的是所谓的“活的法律”。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到底在县以下的乡村是如何贯彻和执行的？除了法律条文，规范农民社会生活的规范还有哪些？维系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固有习惯和行为规范又有哪些？可以称为法律（规范）的时效性和实效性。以上这些问题，“探求“活的法律”的法律社会学者和农村社会学者，一定可以从这个农村惯行调查的实态调查中，找到“活的法律”，来把握农民的实际生活状态。”¹⁵⁾正是这些与农村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活的法律”，形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内在稳定因素，同时，在这样的稳定中，逐渐形成破

13) 平野义太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0页。

14) 平野义太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0页。

15) 平野义太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0页。

坏旧制度束缚的因素，产生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正如前文日本学者所提到的“这个久远民族文化的特长将如何延续这一革命根本问题”。

其次，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研究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乃至整个旧中国农业社会的可贵资料。在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团队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解读的同时，如果进一步结合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报告进行综合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究旧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机制。这些调查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进行的全国农业调查、美国学者卜凯所进行的农村经济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调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等¹⁶⁾。这些研究各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体现出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经济凋敝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于农村前途的关注。同时，学者和革命者们面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问题，希望从农村调查中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平野义太郎提到的：“具体把握亚洲一大农业社会的历史构造和秩序的内在机制”。¹⁷⁾由此可以看出，“亚洲”在学者眼中可以是一个整体，从“全体”的视角，看待亚洲农业社会问题，这种整体性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关注20世纪上半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们的根本关注点应该落在通过对旧中国社会的解读，分析新旧中国的变化，在现实中找到中国农村改革之路。我认为，研究这个变化的过程可以用“传统的”、“革新的”、“未来的”三个阶段来概括，解决中国近代农业社会从怎样的传统中来？通过了怎样的革新？将走向怎样的未来之路？

四、小结

20世纪40年代，由日本的东亚研究会和满铁“惯行班”组成调查团队，选取河北的顺义沙井村（今北京顺义区）、河北良乡吴店村（今北京房山区）、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今河北石家庄栾城县）、山东历城县冷水沟庄（今山东济南历城区）、山东恩城镇后夏寨（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6个村庄进行了农村传统习惯、生产活动与社会秩序的实地调查，称为中国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战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委员会对以上地区的调查报告进行了编辑整理，最终形成了6卷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岩波书店、1952-1958年陆续出版）。

由于惯行调查运用了科学的西方经济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等调查方法，并以细致而丰富的调查内容及原生态的记录方式见长，客观上为研究20世纪上半期的旧中国华北农业社会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分析和解读这份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旧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此外，将此与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农村革命相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方式；与当今农村社会结构及现实生活的变化相比较，可以为探索当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之路作一定参考。在这个层面上看，外国学者的调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交涉学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通过“他者”看中国和中国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利用日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时，研究者还应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该调查报告具有区域特点，

16) 参见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四期，第125-131页。

17) 平野义太郎：《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解题》，《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岩波书店，1981年6月25日，第11页。

华北 6 个县的调查资料不能全面反应整个中国农村的状况，使用中不能以偏概全。其次，报告中的问答资料具备时效性的，有些问题只适用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再次，农民回答问题的真实性值得辨析。面对来自侵略者的文化，被调查者的回答有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思的表达？或者在敏感问题上，是否处于伦理、面子等因素而有所隐瞒。再次，如何辨析问答原始记录中出现的不一致，或者同一人的回答出现前后矛盾，或者不同人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出现矛盾，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和其他的资料相印证来仔细比较和辨析，以复原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

